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重读经典

陈云：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

□ 严国红



陈云同志发表于1939年5月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这篇著作中，陈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求真务实的精神，提出了一名好的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

“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共产党员应该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一方面既要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另一方面也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这就需要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必然性的认识。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洞悉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当前任务和根本目标”，“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二是对中国革命现实曲折性的认识。中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

“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根本政治诉求的政党，而我们的“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一方面，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如果出现了“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不一致”，那么，共产党员必须发扬忠诚精神，“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再一方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仅仅局限于理解“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重大党性原则，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疑惑动摇地执行”。

“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也是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保证。一方面，共产党员要把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当成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在工作实践中积极带头遵守党纪，努力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尤其重要的是，要更加严格地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不得公开党的秘密，也不得对其他党员说出没有必要透露的秘密事件。另一方面，要敢于在“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的同时，“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不能把遵守党纪看作是“在集体实践中表态”或“举手赞成党的路线”那么简单。要坚决反对轻视秘密工作纪律的倾向，坚决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同时，要高度重视违反党的纪律的严重后果，“对于一切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必须受到党的纪律的制裁，直到开除党籍”。

“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党的目标的实现必须以党的决议的实现效果为基础，而党员对于党的决议的执行是党对党员的严格要求，更是党员党性的重要表现。在执行观方面，要做到忠诚与执行的统一。首先，把坚决地执行党的决议当成共产党员的责任，作为忠诚党的事业的具体表现。“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就算完事，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优良的传统，以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困难从而实现党的决议。“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实现党的决议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不能消极应对和执行，必须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努力高效执行党的决议。再次，在执行党的决议时，要有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在“日常工作中”“在有党监督时”“在胜利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相对容易，但“在困难中”“在没有党监督时”“在生死关头时”“在失败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则需要具备“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这样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

“做群众模范”。共产党员是群众所信仰的先进队伍中的一员，人民群众常常根据共产党员的行动来评价我们的党，所以，共产党员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民群众一种好的影响，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更加信仰我们的党，更加敬重我们的党。因此，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先锋模范与无比忠诚的统一”的群众观。首先，要有坚定不移的党的立场。“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还表现在对于革命利益严肃的立场上面，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始终不变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这种“为国为民的事业”斗争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上都不得改变，是经得起任何威胁、任何利诱的。其次，不怕牺牲，无比忠诚。在任何困难面前，要不怕牺牲，也敢于牺牲，要显示中华民族优秀的至高无上的气节，要“表示对于党和革命无比忠诚”。

“学习”。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为了不迷失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做到理论与实际的工作的高度统一，从而“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在学习内容上，一名好的共产党员，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并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同时，努力学习军事知识和技术，尤其重要的是，要在实际工作中随时随地向群众学习，学习“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在学习方法上，首先，要注重自我批评，尤其是要虚心接受党的批评，“好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每个批评都必须以诚恳的态度、愉快的态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错误”。其次，要战胜“学习的敌人”，在学习上，要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一定要克服自高自大、自称高明的错误倾向，要对学习充满信心，主动积极学习。最后，要持之以恒，擅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挤时间学习。

用典释义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

【讲话原文】

严惩腐败分子，加强追逃追赃工作。“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我们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出处】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恶恶。人君不畜恶民，农夫不畜无用之苗。无用之苗，苗之害也；无用之民，民之贼也。鉏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虽周公、孔子不能释刑而用恶。

——（西汉）桓宽《盐铁论·后刑第三十四》

【解读】

《盐铁论》以对话体的形式记述了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与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贤良”“文学”们的辩论。桑弘羊信奉法家，“贤良”“文学”服膺儒家，双方对民间疾苦的根源、同匈奴的和战政策、治国方针和理论等重大问题，在唇枪舌剑中展示了不同的立场。

《盐铁论·后刑》是关于用刑的辩论。贤良主张“先德后刑”，“威厉而不杀，刑设而不犯”。大夫们则坚持“人君不畜恶民，农夫不畜无用之苗”，主张“鉏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鉏：同“锄”。这两句的大意是，锄掉一棵杂草，能使众苗茁壮成长；惩治一个恶民，能使万民欢欣鼓舞。认为依法惩办那些奸佞之徒、害群之马，犹如为禾苗锄草一样，有助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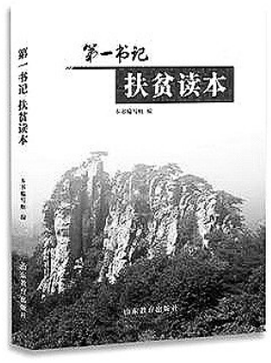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借“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这句古语，表明了我们党对腐败问题的鲜明态度，旨在让正风反腐给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彰显了我们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杨立新）

好书推荐

书名：《第一书记扶贫读本》

作者：本书编写组 编

出版：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6年6月



推荐理由：本书紧紧围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贴近基层，贴近群众，注重实效。书中选用了68个扶贫工作典型案例；收录解读了产业扶贫、行业扶贫、基础设施扶贫、社会扶贫等40多项优惠政策及操作流程；推荐了254个特色产业扶贫实训基地和26个农业科技创新团队以及26个“小贴士”学习资料。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好地学习贯彻中央关于扶贫开发的大政方针，准确把握抓党建促脱贫工作的各项要求，掌握运用各项扶贫政策措施，切实找到帮助贫困群众“造血”的好路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

《管子》箴言选介

□ 瞿孝军

管子有“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之称，《管子》一书中有许多能给人教益的箴言。

“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出自《管子·明法第四十六》。公元前6世纪左右管子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概念，比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观念还要早三百多年。此后，“法为治具”成为历代的一贯认识。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出自《管子·霸言第二十三》。管仲作为历史上首个提出“以人为本”理念的古代思想家，他爱民、重民、利民、富民，一切以民为根本，开创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出自《管子·牧民》。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他认为“礼”就是不能越出应有的节度，思想行为不能超出道德规范；“义”，就是自己不抬高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标准；“廉”，就是廉洁不贪，不隐瞒自己的过失和不端行为；“耻”就是知羞耻，不与道德低下的人同流合污。他认为“礼、义、廉、耻”与法相比，比法更为重要，并且把它们比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出自《管子·牧民》。意思是，政权之所以能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之所以废弛，则因为违逆民心。古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出自《管子·权修第三》。这大概也是中国最早论及育人重要性的观点。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出自《管子·立政第四》。意思是，君主需要审查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大臣的品德与地位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治乱的根源。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德义没有显著于朝廷的人，不可授予尊高的爵位；对于功业没有表现于全国的人，不可给予优厚的俸禄；对于主事没有取信于人民的人，就不能让他做大官。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出自《管子·立政第四》。意思是君主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有四个：一是对于提倡道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不可以授予国家大权；二是对于见到贤能而不让的人，不可以授予尊高爵位；三是对于掌握刑罚而偏袒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于那种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而轻易课取赋税的人，不可以让他做都邑的官。这四条巩固国家的原则是国家安危的根本。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出自《管子·治国》。意思是大凡治国之道，必须让人民先富裕，人民富裕了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困就难治理。所以治理好的国家人民是富足的，治理不好的国家人民一般是贫穷的。管子的《治国》篇中也曾谈到：民富是国强的基础。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出自《管子·牧民》。意思是，百姓粮仓充足才能知道礼仪，丰衣足食才会知晓荣誉和耻辱。管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天下公约仍然能够对各诸侯国的民众形成有效约束。

“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出自《管子·内业》。意思是人应当能善于利用世间万物，而不是被世间万物所役使和束缚。“物”即外物，身外之物、身外世界，是“我”存在的重要参照物。它可以是“我”存在的物质背景，也可以是“我”追逐的目的、对象。

书海泛舟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年第4期要目

专题·司法改革
全面公开审判卷宗的建议与制度设计
于志刚
主办侦查员制度研究
汪海燕 范再峰
法官会议制度若干问题剖析
吴思远

政治学
中国法治模式建构中的政治逻辑
程竹汝
简政放权改革环境下的社会性规制探析——以中国药品准入规制为例
薛澜 郭薇 乔雪
地方政府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数据研判
陈朋

社会学
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家庭福利政策的历史发展与经验规律
刘继同
刚性社会矛盾的内涵与特征——关于我国本世纪以来重大社会矛盾的探解
朱力

中共党史
抗战时期中共媒体形象的塑造——以党报党刊的宣传报道为中心
张卫波
国共三民主义之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1938—1940）
李永进

经济学
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与个人所得税改革
张车伟 赵文
论新形势下社会保障的协调发展
孙祁祥 锁凌燕 郑伟
制度性激励体系、适应性效率与经济结构调整
罗小芳 卢现祥

从《论中国》透视中国外交文化的特点

□ 何康

作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职业外交家，基辛格见证了当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被公认为是当代美国“最了解中国的人”。2011年，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一书，该书结合作者的所见所闻，提出了在新时期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这一时代课题。基辛格特别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他感叹道，“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中国外交文化的特点可以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一些答案。

独特的天下观。由于很早就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文明，加之未曾遇到与自身实力相近或强大于自己的“他者”，传统中国一向视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与许多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中国的这种天下情怀并没有对外扩张的冲动，更多的是强调用文化感化。“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相比武力征服，传统中国更倾向于通过树立表率的作用，静候外界的改变。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大规模对外扩张，且从未有过海外殖民。当年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和综合国力都远胜于西方，但是从未对所经之处提出领土要求，所做的只是扩大贸易往来、传播中华文化。在基辛格看来，这正显示了“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平等观”。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

独特的义利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义利之辨。坚持正确义利观，既凝结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也是中国外交实践的指导原则。近代以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理念似乎成为了国际关系中“不变的原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倡导先义后利、取利有道、义利统一，中国的先贤们一向推崇“义利并重”的原则。这些经典的伦理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总是依照事情的是非曲直独立作出判断，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在基辛格看来，若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及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联系中国历史文化的这种特殊性。从历史的经验中，基辛格发现中国历来奉行的是一种内敛的、防御式的外交策略。中国无意借助强力破坏既有的国际秩序，更多的时候它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超越西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一种“共同进化”的良性伙伴关系。

独特的战略观。中国文化注重相对优势，着眼长远战略。基辛格用围棋与国际象棋的区别来描述这种战略差异。中国的围棋重视持久的、迂回的系统性策略。而西方流行的国际象棋则追求战则必胜，棋手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对手，即把对方的有生力量逼入绝境，令其走投无路。这很直观地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追求“中和”，即各种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正是这种注重系统性和长远性的文化理念，使得中国注重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着眼长远和根本利益，摒弃零和思维，追求合作共赢，自己好也要别人好，大家好才是真正好。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等问题愈加突出，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书而思